

## 唐代咏怀诸葛亮的诗歌

陈翔华

咏怀诸葛亮的诗歌，最早见于东晋桓温（312—373）所作的《八阵图》<sup>①</sup>。晋穆帝永和二年（346），桓温率兵征蜀过鱼腹，赞叹诸葛亮所造八阵图：“此常山蛇势也”。（见《晋书》卷九八本传）《八阵图》诗云：“临源爱往迹”，当作于此时。桓温是一个兼有文武之才，但又久怀异志的权臣。他征蜀时曾问诸葛亮事，并有自比之意<sup>②</sup>。这一首五言短诗不见得有什么深切的寄托，写得也很平庸，所以一直并不引人注目。

在诗歌史上，咏怀诸葛亮诗的创作数量之多，内容之丰富，以及其思想上艺术上对后世影响之大，当然首推唐代诗人的创作。今见清人修纂《全唐诗》，可以检得咏及诸葛亮事迹的作者五十多人、诗一百余首，其中以孔明为主题的诗歌就有四十首左右。咏怀诸葛亮诗，初唐时还比较少，但安史之乱以后便有显著增加，而中晚唐又比以前多，这主要是和唐代社会矛盾的加深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这些诗歌追怀诸葛亮的遗事，评价他的历史活动和作用。许多诗人还借咏古以抒怀，寄托自己对于国事时势的感慨和身世遭遇的愤懑。因此，这些艺术作品既带有咏史诗的特点，但又是抒怀之作。

在唐代咏怀诸葛亮的诗歌创作中，诗人们对他的才能和功业有过不同的评价。

许多诗人高度赞扬诸葛亮，而会昌进士薛能却独加诋毁。他以成败论英雄，在蜀中贬斥“武侯非王佐才”，每每赋诗短诸葛亮的功业。薛能讥讽诸葛亮对魏用兵不过是“生欺仲达徒增气”，认为“流运有功终是扰，阴符多术得非奸”（《筹笔驿》）。他公然嘲笑：“阵图谁许可，庙貌我揄揶”！（《西县途中二十韵》）薛能对诸葛亮表示轻蔑而刻薄地说：“当时诸葛成何事？只合终身作卧龙”（《游嘉州后溪》）。他甚至竟宣称：“焚却《蜀书》宜不读，武侯无可律余身”（《早春书事》）<sup>③</sup>。

在历史上，北魏崔浩、李苗等人对诸葛亮也有过批评（见魏收《魏书》卷四三毛修之传、卷七一李苗传）。但是，除了西晋初年为诸葛亮的仇敌司马氏歌功颂德的庙堂曲辞外，都没有过象薛能这样肆无忌惮地诋毁和嘲讽。无怪乎五代时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说，“（唐）时人以为（薛能）轻薄也”<sup>④</sup>。宋人李昉等编《太平广记》亦谓薛能“放诞”，并迳将其言论归入“轻薄”之属。至明代，王嗣爽撰《杜臆》，则进而斥之为“小儒乱道”（卷七）。

和薛能的态度截然相反，绝大多数诗人几乎众口一词，热烈歌颂诸葛亮：

诸葛才雄已号龙（骆宾王《畴昔篇》）

管乐有才终不忝（李商隐《筹笔驿》）

山秀扶英气，川流入妙思。（殷潜之《题筹笔驿》）

画地乾坤在，濡毫胜负知。艰难同草创，得失计毫厘。（杜牧《和野人殷潜之题筹笔驿十四韵》）

玉垒经纶远（李商隐《武侯庙古柏》）

能以奇用兵（张俨《贞元八年十二月谒先主庙绝句》）

抛掷南阳为主忧，北征东讨尽良筹。（罗隐《筹笔驿》）

以上诗句赞美了诸葛亮的才能。

蜀主相诸葛，功高名亦尊。驱驰千万众，怒目瞰中原。（李华《咏史》）

陈兵剑阁山将动，饮马珠江水不流。（王泠然《咏八阵图送人》）

因机定蜀延袁汉，以计连吴振弱孙。欲尽智能倾僭盗，善持忠节转庸昏。

宣王请战貽巾幗，始见才吞亦气吞。（武少仪《诸葛丞相庙》）

以上诗句颂扬了诸葛亮的功业。

出师表上留遗愿，犹自千年激壮夫。（薛逢《题筹笔驿》）

一过荣异代，三顾盛当时。功德流何远，馨香荐未衰。（杨汝士《和宋人尚书嗣复祠祭武侯毕题临淮公旧碑》）

以上诗句称赞了诸葛亮对后世的积极影响。

然而，对诸葛亮追念最深切，咏怀诗写得最多、而又评价最高的，应当首推伟大诗人杜甫。杜甫在安史之乱以后，避居故蜀之地，“久游巴子国，屡入武侯祠”（《诸葛庙》），时刻难忘“孔明多故事”、“葛亮贵和书有篇”（《赤霄行》等）。他“愁来梁甫吟”（《初冬》），抒写了《蜀相》、《武侯庙》、《八阵图》、《夔州歌》、《咏怀古迹》、《古柏行》等脍炙人口的诗篇。他景仰诸葛亮的“伯仲之间见伊吕，指挥若定失肖曹”（《咏怀古迹》）之品德和才能，倾慕其“功盖三分国，名高八阵图”（《八阵图》）之功业和声誉，热烈歌颂“诸葛大名垂宇宙，宗臣遗像肃清高。三分割据纡筹策，万古云霄一羽毛”（《咏怀古迹》）。杜甫对诸葛亮作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评价<sup>⑤</sup>。

杜甫等唐代诗人对诸葛亮的深切追怀和过分推誉，显然出自对现实的愤懑。当时，权奸执命，朝政日非，社会矛盾逐步激化，统治者面临着深重的危机；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，藩镇割据，战祸不已，国事崎岖，政局板荡。因此，诗人们迫切希望出现诸葛亮式的人物来安定当时的社会。饱经兵灾离乱的杜甫，痛感“万方多难”，赋《登楼》诗，自伤己不能用而“日暮聊为《梁甫吟》”，抒发了“伤时无诸葛之才，以致三朝鼎沸，寇盗频仍”的感慨（见《杜诗镜注》卷十一）。在《夔州歌》绝句第九首中，杜甫面对“干戈满地客愁破”的疮痍河山，念念不忘诸葛亮，并把他比作遮盖“云日如火”的“参天”松柏。这正是表达他“想武侯之神，而干戈之愁可破，承松柏之荫，而云日之炎可凉”的想象和意愿（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卷六下）。这些诗歌都寄托了作者对于当时国步日艰、民生凋敝的忧患和愤慨。

## 二

在科学不发达、唯心史观盛行的时代，人们由于过分崇敬自己所爱戴的人物，而往往把他装扮成超凡脱俗的神圣。诸葛亮正是这样一个人物。本来，“诸葛蜀人爱”（杜甫《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》），早在他去世以后不久，“黎庶追思”（《三国志》本传），而至“百姓巷祭，戎夷野祀”（见同上书裴注）。到了唐代，“大树思冯异，甘棠忆召公”（李商隐《武侯庙古柏》），“武侯死殆五百载，迄今梁、汉之民，歌道遗烈，庙而祭者如在，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”（孙樵《刻武侯碑阴》）。晚唐诗人杨嗣复则在《丁巳岁八月祭武侯祠堂因题临淮公旧碑》一诗中，进而说到时人对他的推崇：“谋猷期作圣，风俗奉为神。”

儒家学说创始人孔丘，自汉以来受到了统治者的独尊，而唐代诗人却把这个并非儒者的诸葛亮拿来同孔圣人相提并论：

池上昔游夫子风，云间初起武侯龙。（赵嘏《述怀上令狐相公》）

宣父道高休叹凤，武侯才大本吟龙。（罗隐《淮南送李司空朝觐》）

历史上的诸葛亮原是一个“科教严明，赏罚必信”（《三国志》本传）的封建阶级政治家。东晋小说家裴启把他描绘成了“名士”（见《语林》）。唐代诗人们不仅儒化诸葛亮，进而还把他抬高到了圣贤的地位。出身于“奉儒守官”家庭的杜甫，就曾说他自己：“凄其望吕葛，不复梦周孔”（《晚登夔上堂》）；他在《诸葛庙》等诗中，一直是把诸葛亮当作圣贤来崇拜的。

在唐代，诸葛亮还被奉为神明。祭祀他的活动，一直是“馨香荐未衰”（杨汝士诗）。“鼓吹青林下，时闻祭武侯”（李频《送友人游蜀》），“山姥烧钱古柏寒”（章孝标《诸葛武侯庙》），“独把一樽和泪酒，隔云遥奠武侯祠”（韦庄《喻东军》）等诗句，反映了当时祭祀的普遍和频繁。因此，“异代揖芳尘”（杨嗣复诗），诸葛亮也就被当作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：

敬名探国志，饰像慰毗思。（杨汝士《祠祭武侯毕题临淮公旧碑》）

执筒焚香入庙门，武侯神象俨如存。（武少仪《诸葛丞相庙》）

结果，诸葛亮变成了一个死而还能造福于民众的神祇。尚驰在《诸葛武侯庙碑铭序》一文中，说：“至今官书庙食，成不刊之典，一山之内，每有风行草动，状带威神，若岁大旱，邦人祷之，能为云为雨，是谓存与没人皆福利，生死古今一也。死而不朽，反贵于生。”（《唐文粹》卷五五上）这说明汉中一带由于对诸葛亮的崇拜而造成了迷信的流行。

由于把诸葛亮奉为神明，唐代诗人们也描绘他迥然不同于世间凡响。例如，描写他出茅庐：

忆昔南阳顾草庐，便乘雷电捧乘舆。（李山甫《代孔明哭先主》）

### 描写他本领出众：

轩皇传上略，蜀相运神机。水落龙蛇出，沙平鹧鸪飞。波涛无动势，鳞介避余威。……（刘禹锡《观八阵图》）

鲸鬣翻腾四海波，始将天意用干戈。尽驱神鬼随鞭策，全罩英雄入网罗。（李山甫《又代孔明哭先主》）

猿鸟犹疑畏简书，风云常为护储胥。（李商隐《筹笔驿》）

任贤无间忌，报国尽神机。（李中《读蜀志》）

### 描绘他死时的怪异现象：

天晴杀气屯关右，夜半妖星照渭滨。（温庭筠《过五丈原》）

长星不为英雄住，半夜流光落九垓。（胡曾《五丈原》）

### 表现诸葛亮死后的精神长存：

遗庙空肃然，英灵贯千岁。（岑参《先主武侯庙》）

密叶四时同一色，高枝千岁对孤峰。此中疑有精灵在，为见盘根似卧龙。

（雍陶《武侯庙古柏》）⑥

等等。诗人们用“乘雷电”、“运神机”、“挥神笔”、“驱神鬼”，以及“长星”、“流光”、“英灵”、“精灵”之类语词，来形容诸葛亮的超凡脱俗和神秘莫测。

六朝时，已有诸葛亮怪异的记载（如干宝《晋纪》等）；隋时，又有诸葛亮预知后世事的传说（《隋书·史万岁传》）。到了唐代，还出现诸葛亮死而“踏土照镜”、“怖生仲达”（《四分律行事钞批》等），和降生为“蜀门帅”韦皋（《宣室志》）等迷信色彩浓厚的离奇故事。当时诗人们虽然并不如此荒诞，却也在大力神化诸葛亮，把他从烟火的人间捧入到神圣的天国。这些

描写尽管是**多少**反映出当时群众的情绪，但不能不说带有比较严重的历史局限。

### 三

诗人李白在《读诸葛武侯传书怀》中，以倾慕诸葛亮建功立业的心情，热烈讴歌：“鱼水三顾合，风云四海生。武侯立岷蜀，壮志吞咸京”。李白在诗中指出，诸葛亮所以在历史上“风云四海生”，施展自己的才能，开创蜀汉事业，使当时局势为之改观，主要原因乃由于刘备的“鱼水三顾合”。

热烈颂扬“鱼水三顾合，风云四海生”，是唐代咏怀诸葛亮诗的一个显著特点。

在封建社会里，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，使君臣间充满了阴谋、猜忌、反叛和残杀，根本谈不上信任和友谊。主忌而臣疑，贤能不得其用，是当时的普遍现象。但是，历史上刘备和诸葛亮之间，却能和睦相处。裴松之说：“观亮君臣相遇，可谓希世一时，终始之分，谁能圆之？”<sup>⑦</sup>于是，唐代诗人就大肆美化和宣扬：

先主与武侯，相逢云雷际。感通君臣分，义激鱼水契。（岑参《先主武侯庙》）

小白鸿翼于夷吾（管仲），刘葛鱼水本无二。（李白《君道曲》）

君臣当共济，贤圣亦同时。翊戴归先主，并吞更出师。（杜甫《诸葛庙》）

草昧争雄者，君臣似此稀。（李中《读蜀志》）

把他们奉为古往今来图王者的君臣典范。

诗人们进而强调指出，“孔明有知音”（杜甫《遣兴》），是因为：第一，刘备如饥似渴地求贤。“蜀王不自垂三顾，争得先生出旧庐”（胡曾《南阳》）。“豫州军败信途穷，徐庶推能荐卧龙。不是卑词三访谒，谁令玄德主巴邛”（周昙《蜀先主》）。

第二，刘备不加猜忌地任贤。“蜀主脱嫌疑”（杜甫《昔

游》），“得士契无邻”（杜甫《谒先主庙》），“任贤无间忌”（李中《读蜀志》）。

这些咏怀诗形象地揭示，“有国由来在得贤”（李九龄《读三国志》）；刘备的谦恭下士和任贤无猜的结果，不仅使他“得相能开国”（刘禹锡《蜀先主庙》），而且还使诸葛亮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能。在“鼎分天地日，先主力元微。鱼水从相得，山河遂有归”（李中《读蜀志》）这幅历史巨画中，诗人们突出地强调，正是刘备的频繁三顾，而才致使：

诸葛亮以“慷慨匡时略”（杜牧《和野人殷潜之题筹笔驿十四韵》），“鼎分天下一言中”（崔道融《过隆中》），“武侯偃起赞许谟”（薛逢《题筹笔驿》），“酌量诸夏须平取，期刻群雄待遍锄”（李山甫《代孔明哭先主》），为刘备绘制了联吴抗曹、夺荆州、取益州的战略蓝图；

诸葛亮“忽遭玄德云，遂起鳞鱼斗”（陆龟蒙《读襄阳耆旧传》），“卧龙决起为时君”（杨嗣复《题李处士山居》），“拟称三汉更图王”（窦常《谒诸葛武侯庙》），为建立蜀汉政权和力图统一中国的事业而斗争；

诸葛亮“忠佐为心腹”（杨炯《广溪峡》），以“两朝开济老臣心”（杜甫《蜀相》），“奏书辞后主，仗剑出全师”（殷潜之《题筹笔驿》），直至“志决身歼军务劳”（杜甫《咏怀古迹》），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。

通过这些描写，唐代诗人塑造了一个受“明主”知遇，而“誓将雄略酬三顾”（胡曾《泸水》）的诸葛亮形象。

然而，一切怀古诗都意在遣兴。正如王嗣爽在论杜诗时指出：“俱借古人以遣自己之兴，非尚论古人也”（《杜臆》卷三）。唐代诗人呕心沥血地描写“酬三顾”的诸葛亮形象，是在于寄托自己渴求用世的心情和怀才不遇的幽愤，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嫉贤

忌能进行了抨击。以“匡君怀长策”（《赠友人》）、“颇怀拯物情”（《读诸葛武侯传书怀》）自诩的李白，在《留别王司马嵩》诗中说：“余亦南阳子，时为《梁甫吟》，……愿一佐明主，功成还旧林”；杜甫亦屡为《梁甫吟》，也无非表白自己：“如诸葛之得君以驱驰，此吾之本怀也”（《杜臆》卷九）。尽管唐代诗人决心要象诸葛亮那样贡献出自己全部的才智，但是“南阳卧久无人问”（刘兼《秋夕书怀》），当时的世界上并找不到一个求贤若渴的“刘备”。因此，李白无可奈何地感慨：“自言管、葛竟谁许？长吁莫错还闭关”（《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》）；杜甫也怅恨不已地哀叹：“志士幽人莫怨嗟，古来材大难为用！”（《古柏行》）杜甫咏诸葛亮的名篇《古柏行》，发兴于古柏，以倾诉自己怀才不遇的哀怨，“俱为志士幽人写照”（浦二田语，见《杜诗镜诠》卷十二）。虽然，诗人站在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上，抒发的是个人失意的情怀，但是愤然唱出了“古来材大难为用”这曲几千年来幽士们的悲歌，而对过去时代统治者的嫉贤忌能，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和抗议！

#### 四

唐代咏怀诸葛亮诗。不仅有广泛的社会影响<sup>⑥</sup>，而且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也产生了积极作用。

这些诗歌在文学史上，开启了王安石、苏轼、陆游、叶适、王十朋、文天祥、杨维桢、刘基、于谦、李东阳、杨慎、顾炎武、王士禛、赵翼、张问陶、舒位等人咏怀孔明诗的创作，并且进一步促使诸葛亮故事的广泛传播。其中不少成功之作，还为小说《三国志平话》、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等直接引录，而成为其艺术作品的构成部分。

特别应当指出，这些唐代咏怀诗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以及其突出“三顾”作用等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对后来的故事传说

和小说、戏曲的创作，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。

从主题思想上来看，罗贯中竭尽全力描写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，显然是承袭了胡曾《南阳》：“蜀王不自垂三顾，争得先生出旧庐”和《泸水》：“誓将雄略酬三顾”的诗意。

从故事创作上来看，例如东坡《仇池笔记》写杜甫托梦对“世人误会《八阵图》诗”的驳正，可见宋人已有据“遗恨失吞吴”诗句而产生“先主、武侯欲与关羽复仇”的故事（参见《类说》）。元人关汉卿杂剧《双赴梦》写诸葛亮等要为关羽、张飞复仇的思想，以及元明间无名氏杂剧《诸葛亮石伐陆逊》（佚）的故事，也都是抛开史实的束缚而受杜诗“遗恨失吞吴”及由此产生“复仇”故事影响的结果。

从文字描写上来看，《清平山堂话本》欹枕集下《夔关姚卞吊诸葛》等还沿袭了唐诗的许多句子。这篇话本除了直接引录杜甫《八阵图》诗外，还写姚卞所填的词：“三顾频繁，两朝开济，何处寻遗迹？”“见说祠堂今尚在，中有参天松柏。巡蜀英谋，吞吴遗恨，俯仰成今昔”等句子，无不是从杜诗《蜀相》、《夔州歌》等衍化而来的。

由此可见，这些唐诗对后人的创作，影响是十分显著的。

唐代的一些咏怀诸葛亮诗，是成熟的艺术作品。这些诗歌虽然出自封建士大夫之手，而且也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评价这个历史人物，但是绝非无病呻吟之作。它以一定的进步倾向和独有的艺术特色，发展了魏晋以来咏怀诗的传统，大大丰富了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艺术宝库，并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效果。今天，我们应当重视这份文学遗产，区分其精华和糟粕，总结其经验和教训，以作为创作现代咏怀诗的借鉴。

1964年2月初稿，1980年5月重新修改。

## 注:

①桓温《八阵图》：“望古识其真，临源爱往迹。恐君遗事节，聊下南山石。”（《全晋诗》卷五，见丁福保编《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》）

按：在桓温以前，西晋王朝开国初年制作的庙堂歌舞曲辞《鼓吹曲辞·惟庸蜀》、《舞曲歌辞·天命篇》、《鼓吹曲辞·宣受命》等，已涉及诸葛亮事。其云：“诸葛不知命，肆逆乱天常”、“亮乃畏天威，未战先仆僵”、“亮乃震撼天下宁”等等，不仅内容上为司马氏歌功颂德而严重歪曲历史，并且毫无艺术价值。这些无咏怀之意的庙堂歌辞，当然不应算作怀孔明诗。

②梁时殷芸（471—529）《小说》：“桓宣武征蜀，犹见武侯时小吏，年百余岁。桓问：‘诸葛丞相，今谁可比？’意颇自矜。答曰：‘葛公在时，亦不觉异，自葛公歿后，正不见其比’”。（参见余嘉锡辑证本）

③薛能《筹笔驿》自序云：“余为蜀从事，病武侯非王佐才，因有是题。”考《唐才子传》卷七，薛能约于咸通间在蜀，其贬亮诗当作于此时。

薛诗见《全唐诗》（中华书局本）。本文以下所引唐人各诗，均见此本。（《全唐诗》中还收入一些由唐入五代的诗人创作，本文依例酌引个别诗句。）

④见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六五引（谈氏初印本）。

⑤关于杜甫咏亮诗，可参见拙作《读杜甫的咏怀诸葛亮孔明诗》，1965年8月29日《光明日报》文学遗产第522期。

⑥此诗一作陆龟蒙诗，题《孔明庙柏》，末句“为见”作“曾见”。见清人李复心编《忠武祠墓志》卷七诗赋下。

《全唐诗》所收诗句多有异文，本文不另注出，以免繁复。

⑦见《三国志》卷三五诸葛亮本传注。

⑧唐代咏怀孔明诗，对宋代民族英雄宗泽、文天祥等都有积极影响。宗泽临终时，一面高呼“过河！”一面就长吟杜甫歌颂诸葛亮的名句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！”（见《宋史》本传、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六一）